

考证

《云麾将军李秀碑》探析

张云燕

《唐故云麾将军李秀碑》(以下简称《李秀碑》)

由盛唐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李邕撰文并手书，太原郭卓然篆额并摹写上石。李邕撰文并书写的《云麾将军碑》有两通流传至今，一通是现在仍竖立在陕西蒲城县桥陵陵园内的《唐故右武卫大将军李思训碑》，以碑文首题第一个官称《唐故云麾将军》而衍称为《云麾将军碑》，古今相沿，亦称《南云麾》，一通即本文介绍的《云麾将军李秀碑》，史称《北云麾》。《李秀碑》作为北京现存为数不多的唐碑之一，不仅碑文极具历史价值，且以骨丰肉润、端庄肃穆的书风在传世的李邕书法作品独树一帜，对后世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秀碑》原石的流传

《李秀碑》至迟在明代就已残毁，又经历了数度迁徙，今天仅余下两枚柱础石嵌于文天祥祠后堂壁间，文字不足两百。碑石的流传过程颇具传奇色彩，古人也有不少记述，但仍有几个问题尚未厘清。此处笔者便通过文献记载和几种传世拓本的情况，对李秀碑《颠沛流离》的过往做一梳理。

(一) 唐天宝元年—明万历六年 碑石所在地：良乡

在这一阶段，李秀碑经历了刻立、存续、迁址、损

毁、改制、废弃的坎坷命运。

李秀与夫人《天宝元载合葬于范阳福祿乡原》，然明清文献多将《良乡县学》作为它的出处。古时公学往往亦是古碑名刻的集中之地，李秀碑大概在五代至金元之间完成了第一次迁徙，即从李氏墓园移至县学以供好古者追慕瞻赏。然而好景不长，李秀碑《不知何时为校官裂为柱础》。后因重修学舍，柱础残石被更换下来，与其余石块瓦砾等《建筑垃圾》堆在一起，无人关心了。

故宫藏《李秀碑》全拓本卷首有俞希鲁题记，其中提到《数年前有客自范阳来，尝持此碑见赠，……恐岁久漫灭，重加搜剔》，当时是龙凤五年（一三五九年）十月，可知至少在此之前不久，碑石仍没有被改制为建筑构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李秀碑仍然完好无损。从传世拓本的情况来看，碑石很可能至迟在元明之际就已有相当程度的毁损，随后才被改制成柱础等石料。《良乡县志》记有万历五、六年间知县洪一谟重修学宫事，埋入大殿的柱础石正是在这次改建时重见天日的。

(二) 明万历六年—清康熙三十一年 碑石所在地：古墨斋、顺天府衙署

李秀碑石在此期间经历了两次迁徙，原石的大部分都已佚失，仅剩下两枚柱础。

关于李秀碑是如何从良乡迁到宛平的，《宛署杂记》中所录《古墨斋记》的记述较为可信。宛平县令李荫得知李秀碑残柱础被《推之瓦砾中》仍《规如铁鉴》，字尚未泐》的情况下，派车将残石运进城内，垫于署壁，请王世懋题之曰《古墨斋》。^[1]另一方面，《帝京景物略》等书记载李荫在《署中掘地得柱础六枚》，^[2]应系误传。

(三) 清康熙三十一年—今 碑石所在地：文天祥祠

时任顺天府丞的吴涵在庭院荒草间发现柱础两枚，垫于文天祥祠壁间，并做《云麾将军断碑记》叙述古碑

失而复得的经过。文字甚为详备，此处不再赘述。

《李秀碑》的几种拓本

由于碑石的残损十分严重，今天我们对《李秀碑》的认识、欣赏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流传下来的各种拓本。现将几种主要拓本的情况介绍如下：

(一) 故宫藏《李秀碑》全拓

这是目前所知《李秀碑》拓本中最完整、历史价值与书法艺术价值最高的一部。对它年代的判定说法不一。清代朱为弼、蒋策等人鉴定为《宋末元初遗迹》，叶昌炽在《语石》、《缘督庐日记抄》等书中称之为金拓；岑仲勉认为它是宋人翻刻碑文的拓本。追寻其流传的痕迹，可知拓本龙凤五年时为甘露无二長老购得，京口顾观、俞希鲁皆有题跋。它初次进入京畿金石藏家的视野是在嘉庆二十五年，琉璃厂书画楼老板陈万璋从汴梁一郭姓人士手中购得。购入时拓本业已破碎，次序颠倒混乱无法成读，陈君《就五石分裂之痕，追其连属之迹》（以翁方纲摹刻于法源寺悯忠阁的拓本为依据）连续成文，终能《天衣无缝》，得一千五百二十九字，仅剥蚀廿余字，基本还原了千年前碑文的原貌。朱为弼、蒋策等人以之为底本于法源寺重刻一碑。

陈万璋去世后，李宗瀚从陈家购入此本，后归于仁和王存善。历经辗转，这份珍贵的拓本最终被故宫博物院收藏。

(二) 莫氏藏宝墨斋本

这份拓本亦为李宗瀚购得，后归潘德舆，同治六年为孔广陶收藏，宣统时期归于辛仿苏。有王世贞明神宗六年手跋（当年李荫自良乡觅得残存碑石、建筑古墨斋），另有董其昌、孔广陶、翁方纲等人跋文。李宗瀚记存五百七十余字。董其昌等皆称其为唐拓，然存字过少，且文字多颠倒混乱之处，无法连贯。若为唐拓，应不致脱漏如此之多，因此更可能是原碑残毁碎裂之后的集拓。

(三) 杨恽曾家藏明拓

这份拓本年代不是最古，文献记载也极少。但因嘉庆十年（一八〇五）由翁方纲摹写，胡逊刻石于法源寺之悯忠阁，自此知名。共存残石五块，计额一、横石一、圆础二、半础一，三百四十七字。

这份拓本也是在内容上与《宛署杂记》中古墨斋存石录文最为相近的一种，可以由此推测万历年间残碑出土时的面貌。《宛署杂记》中的录文共一百八十六字，经比较可知篆额、横石的字迹完全相同，其余三枚柱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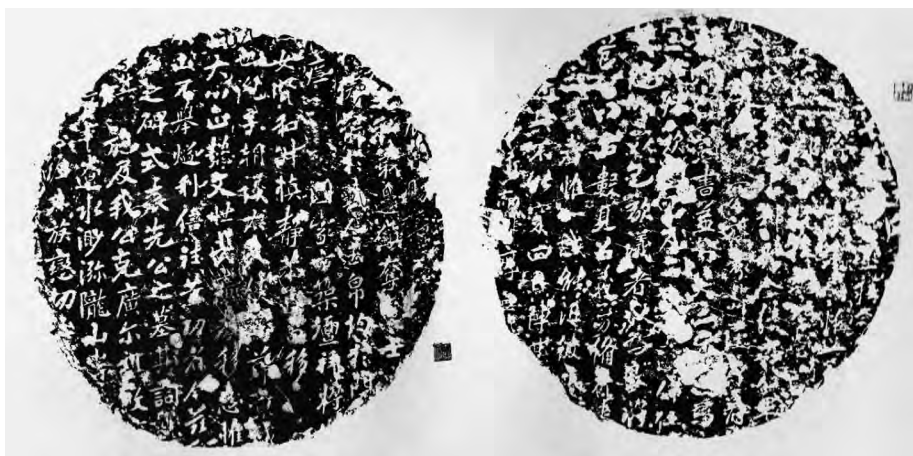


翁方纲摹李秀碑残石拓片 石在北京法源寺

的文字也多有重合之处，且没有超出翁摹本的内容。可见杨氏藏拓很有可能便是《古墨斋初期》的拓本。因此可以推知，万历年间李荫发现的李秀碑残石不仅有或完整或残损的柱础石，也包括了一部分从碑上所下的碎石料。而年深日久，碑石再度迁徙时，其他碎石终湮灭不知所踪，只有两枚完整的石础得以存留。

（四）吴门蒋春皋家藏本

钱泳自蒋春皋家得见此本，于嘉庆元年六月双钩



李秀碑残石柱础拓片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一本赠予北平翁方纲。嘉庆四年，时任宛平县令的胡逊以钱泳双钩本摹刻上石，镌于署壁，循李荫旧题曰《古墨斋》。可惜刻石今天已难觅踪迹，《宛平县志》等书上也没有相关记载。翁方纲曾有一长跋略记其文，称有董其昌等人跋文称其为唐拓，并判断此本即董其昌刻入《戏鸿堂帖》者。但将翁方纲的录文与《戏鸿堂帖》本对照可知二者恐非同源。

（五）《戏鸿堂帖》所刻本

此本存三百二十八字，另有六十五字与碑文不相连属。董将其合刻于同一条目下，记为《李北海书》，没有指明具体碑版。董其昌有跋称其为唐拓，然从存字量和内容连缀等来看，是唐拓的可能性甚微。董曾数次称见过《李秀碑》全本，如《所收宋人重刻本，全文可读》，《曾于海上顾氏得全本》云云，然而刻本的文字顺序与今存的两枚柱础石相差很大，可知董其昌应不曾见过《全文可读》的墨本。将帖中文字与残础和其他拓本相对照，尚有不相符合之处，如以《日》代《日》；故宫本、蒋氏本等均作《草树萧条》，此本作《草树萧（萧萧）》。是所据底本不同，还是刻帖时的讹误，今天已经很难考证了。

碑文中反映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李秀碑》的创作时间

读《李秀碑》时会发现，碑文的写作时间与撰书人结衔之间存在矛盾。《旧唐书》记载，天宝元年二月二十日丙申，《天下诸州改为郡，刺史改为太守》^①。碑文中李邕自称《灵昌郡太守》，称李偃《守景城郡太守》，以理推之，《李秀碑》应撰写于朝廷改制命令推行之后，即至早也在天宝元年二月底方才完成。这就与碑文中《天宝元载岁在壬午正月丁未朔，十日建》的叙述不合。这样的《时间差》是怎样产生的呢？我们不妨做一推测。碑文中记载李秀卒于开元四年四月一日，此碑为天宝元年合葬夫人班氏时所立。从范阳（今北京）至



唐 李邕 行书李秀碑(部分) 天宝元年(745) 宋拓本 故宫博物院藏 原石在北京良乡 今佚

滑州(今河南滑县)不止千里(今日从北京到滑县走大广高速约五七七公里,走京珠高速约五九一公里),而骑马行进的速度大多数情况下日行不过百里,要完成合葬事宜,赴滑州求取李邕撰写并手书的碑文,再赶回范阳摹勒上石,必然需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而当时向李邕求取碑文的人又非常之多,李邕传中记载『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4]既然李邕的应酬如此忙碌,只怕也不大会专门赶写李秀夫妇碑文这样的『急件』,甚至很可能出现赶制不及不得不延后的状况。虽然李邕完成碑文时已经至少是天宝元年的二月下旬,但立石月日是李秀家人为其提供的,应当

也经过了星家的占卜,甚至可能在合祔时已择吉日立好石碑,只待求得碑文摹刻上石,因此李邕也不好代为更改。如此解释尽管只是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上,但在情理上也能说得通。不过《李秀碑》的书撰时间应该不会相差天宝元年正月过远,且肯定在其后,应是毋庸置疑的。

(二) 李秀的家族世系

李秀的祖父李楷和父亲李谨行都是唐初名臣,旧、新《唐书》皆有传可查。李楷原名突地稽(一作度地稽),是粟末靺鞨一族的酋长,内附后因军功被赐姓李氏。李谨行更是战绩卓越,是陪葬乾陵的十七位宗亲、功臣中唯一的蕃将。

突地稽率部归唐后,唐一力优待,以隋安置其部众之地为燕州,任命突地稽为总管,直到建中初燕州为朱滔所破为止,其家『累代袭燕州刺史』。^[5]故碑文中有『地雄一方,鼎贵百代』、『良将之子,名公之家』等语。

然而李秀碑文中却完全看不到出身靺鞨的痕迹,反而伪冒士籍,攀附陇西李氏,将世系追溯至前燕时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李秀是靺鞨该部内附的第三代,且以兵法武艺传家,世守燕州、辽东等地,在当时其归化人的身份应是众人皆知的。从李秀碑对郡望和士族身份的伪冒,可以看到归化的少数民族受唐风汉俗影响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能反映出唐代谱系、郡望观念的虚化。

《李秀碑》书法赏析

《李秀碑》属于李邕晚年的作品,在诸多北海传世书中独树一帜,骨肉丰满,笔势劲道,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审美意趣。

(一) 行、楷一体,相互交融

『古来书碑者,在汉魏必以隶书,在晋宋六朝必以真书』,^[6]意在庄重典雅。李邕却能从书体上独辟蹊径,在魏晋行书风格的基础上兼及北碑笔法与初唐楷书,打

破行、楷两种书体的界限,通过大胆的探索创新和身体力行的高水平艺术实践,开创了一种兼具风流轻便与严谨缜密的铭石书体——『行楷』,打破庄严凝重的成规,赋予刻石书法较多的自由。启功先生曾赞叹道:『行押书碑,……李泰和出,始称登峰造极』。^[7]

《李秀碑》通篇碑文奇而不险,美而不媚,是其『行楷』书体的绝佳体现。碑文的用笔方圆并施,以方折劲挺为主,落笔沉着坚实且富于变化。横、竖笔画多用方笔,圭角明显,厚重稳健,楷书意味更浓,形成峻峭而有骨力的风格,如有、明、年、山等字。撇、捺用笔则多连绵曲折,流畅舒缓,含蓄中蕴含强劲,颇得二王神韵,如多、天、文、敌等字。一字中笔画粗细不一,也有的字虽相同,但写法各异。通篇兼得楷书的方整规矩与行书的妩媚圆转,『势方而韵圆,笔骏而度缓』,^[8]产生了时圆时方、时滑时涩的韵律般的效果。

在结体方面,《李秀碑》沿袭了李邕书法欹侧奇崛的特点,结体左低右高,特别是横笔的倾斜尤其明显,观之极富动感。

(二) 刚柔并济,文质相得

从书法风格上看,《李秀碑》豪放与隽秀并举,将二王秀美儒雅的风格与初唐严谨刚健的气质完美地融为一体。

《李秀碑》通篇点画流畅,结字生动,稳而不平,保留了行书中精美的笔致与玲珑剔透的体式,字里行间流露出风神爽朗、潇洒明快的特质。然而李邕的可贵之处在于打破前贤成法,『放笔差增其豪,丰体使其益媚』,^[9]兼纳北碑笔意,并师法初唐虞、欧诸家,使魏晋行书敛入规矩,形成了笔方架圆、峻峭豪劲的风格。通过将《李秀碑》与初唐最为盛行的王羲之书法《怀仁集圣教序》对照比较,不难看出其中对王羲之书法的模仿、继承与创新。《续书断》中评价:『邕书如宽大长者,逶迤恣肆,而终归于法度』,^[10]杨士奇赞曰:北海『矩度森严,筋骨雄健,沉着飞动,引笔有千钧

表一

圣教序								
李秀碑								

表二

李思训碑							
李秀碑							

之力，故可宝也」，^①正是赞颂这种华美与刚健并重、风流与法度兼得的独特书风。（表一）

（三）沉静端肃，遒劲雍容

作为一代书坛名家，李邕书法的风格无疑是绚丽多彩的。综观其传世的各种碑帖，有《李思训碑》的刚劲挺秀，《法华寺碑》的温润清丽，《卢正道碑》的绚丽华贵，《麓山寺碑》则骨力内蕴，沉稳豪迈。李邕书写《李秀碑》时已六十有余，落笔圆熟精到，挥洒自如。此碑以雍容大度、肃静沉着的气质独树一帜，成为李邕书法风格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环。

表二是《李秀碑》与《南云麾》《李思训碑》的对照。《李思训碑》用笔瘦硬，线条纤细，以筋骨为胜。结体上近乎夸张地取势，横笔极力向右上方伸展，将李邕《劲险》的书风挥洒得淋漓尽致。《李秀碑》笔力沉着扎实，使转自然流畅，笔势劲道，骨丰肉润。单个文字的结体虽也有欹侧倾斜之势，但胜在宽博沉厚，奇而能稳。通篇多玲珑剔透的畅达，少奇崛凌厉的险绝。风格气质平和宁静，端庄秀丽，内含强劲而流美于外。李宗瀚赞其「偶倪沉雄」，姚茫父曰「肥中藏秀」，顾观跋文谓「沉着痛快，中有含蓄浑融之妙」，正道出《李秀碑》书风的独特之处。（表二）

从北宋中后期开始，文人士大夫的美学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价前代的艺术。李邕书法的历史价值也在这场变革中得到了重新的阐释和确立，影响日益扩大。苏轼「直到晚年师北海，更于平淡见天真」。^②以赵孟頫为首的一批元代优秀书家对李邕书法的取法，在相当大程度上推动了元代上追晋唐、复古求新的书风的形成。在李邕的传世碑帖中，《李秀碑》因其雄浑的气势和秀逸的风骨为众多书家注目。董其昌曾赞誉它「雄秀异常」，并以其笔意书写了《乐志论》。^③清代书法家翁方纲对《李秀碑》极为重视，心摹手追，毕生不辍。至民国五年（一九一六），时藏于王存善之手的《云麾李秀碑》完本由上海文明书局影印

出版，从此这通古老的著名碑版在广大书者的欣赏和临习之中焕发出全新的光彩。

（本文写作中承蒙故宫尹一梅老师代为查阅核对拓片，在此谨致谢意！）

注释：

- ①（明）沈榜编《宛署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一七页。《古墨斋记》是万历六年李荫修亭完毕时所刻，《宛署杂记》的作者沈榜万历十八年时任宛平知县，为李荫后进，他对这篇记文的引录也不会有大的出入。《燕都游览志》、《云麾将军断碑记》、《钦定日下旧闻考》、《观妙斋藏金石文考略》等均采此说。
- ②（明）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年，三六页。《春明梦余录》、《金石文字记》、民国《宛平县志》等书都采纳这一观点。
- ③（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年，二一五页。
- ④《旧唐书》，五〇四三页。
- ⑤（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九《引》《郡国县道记》，中华书局，二〇〇七年，一四〇一页。
- ⑥（清）钱泳撰、张伟校点《履园丛话·书学》，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二九三页。
- ⑦启功《论书绝句》，台湾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九八页。
- ⑧朱关田《李邕书法评传》，《中国书法全集·李邕卷》，荣宝斋，一九九六年，一四四页。
- ⑨（明）杨慎撰：《墨池琐录》卷二，见崔尔平选编点校《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八四页。其中记「李北海书云麾将军碑为第一。……云麾碑刻在长安良乡县，石拓本远不如也。今长安碑已亡，惜哉！」将南云麾和北云麾二碑混淆。
- ⑩（宋）朱长文《续书断》，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三四一页。
- ⑪（明）杨士奇撰《东里续集卷二十题李北海岳麓寺碑》，见《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六。
- ⑫（清）王文治《论书绝句》，转引自王鼎《宋明美学观念衍变与李邕行书价值确立》，《书法世界》二〇〇四年第十二期，一六页。
- ⑬（明）董其昌《书乐志论跋》，（清）李光映《金石文考略》，《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三四册，新文丰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三二二页。

（作者单位：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本文责编：张永强）